

浅论人生境界的策略性回归

魏佳琪

郑州大学哲学学院, 河南 郑州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2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1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30日

摘要

文章以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说为理论框架, 聚焦于其现实应用中出现的“策略性回归”现象。冯友兰所提出的自然、功利、道德与天地四重境界, 强调通过“觉解”实现由低至高的精神跃升。然而现实中存在一类情形: 个体虽具备较高程度的觉解与道德自觉, 却因社会结构、生存压力或制度限制等因素, 被迫优先采取功利甚至自然境界的行为策略。本文通过分析理想主义实践者的困境等案例, 指出这种“策略性回归”并非单纯的境界倒退, 而是现实与理想张力的体现, 也反映出冯友兰境界理论在社会结构与物质条件维度上的局限。真正的境界持守不在于永久居于高阶, 而在于现实的拉扯中保持对高境界的向往与反省能力, 这本身就是一种现代语境下的道德实践。

关键词

人生境界说, 道德, 功利, 策略性回归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Strategic Regression of the Realm of Life

Jiaqi Wei

School of Philosophy,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Received: May 26, 2026; accepted: June 18, 2026; published: June 30, 2026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Feng Youlan's theory of the Four Realms of Life as its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cusing on the phenomenon of "strategic regression" that emerges in its practical application. Feng Youlan proposes four ascending realms—the Natural Realm, the Utilitarian Realm, the Moral Realm, and the Transcendent Realm—emphasizing a spiritual ascent from lower to higher levels through "enlightened awareness" (juejie). However, in reality, there exists a type of situation: individuals, despite possessing a high degree of enlightened awareness and moral consciousness, are compelled

by factors such as social structures, survival pressures, or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to prioritize behavioral strategies belonging to the Utilitarian or even the Natural Realm. Through an analysis of cases such as the dilemmas faced by idealistic practitioner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such “strategic regression” is not simply a retrogression of realms, but rather a manifestation of the tension between ideals and reality. It also reveals the limitations of Feng Youlan’s theory of realms with respect to social structure and material conditions. True adherence to a higher realm does not consist in permanently residing at a high level, but in maintaining an aspiration toward and capacity for reflection on higher realms amidst the pull of reality. This very process constitutes a form of moral practice in the modern context.

Keywords

Theory of Realms of Human Life, Morality, Utility, Strategic Regress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冯友兰在《贞元六书》中提出人生四境界说，从低到高依次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这四种境界的高低差异主要源于觉解程度的不同。在《新原人》中，冯友兰已阐明四境界是由低到高的关系：“境界有高低，所谓高低的分别是以到某种境界所需要底人的觉解的多少为标准。其需要觉解多者，其境界高。”[1]学界对冯友兰境界说的研究，多集中于其理论体系的建构、四境界的内涵辨析，以及其对于提升个体精神境界的积极价值。杜保瑞将其定位为冯友兰以儒家意识为本位重构中国哲学史的核心框架[2]；陈来则着重阐释了天地境界中“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积极神秘主义特征[3]。这些研究主要遵循冯友兰本人的理想进路，探讨如何从低到高实现境界提升。然而对境界在现实运行中可能出现的“逆向”或“回落”现象，以及个体在社会压力下的策略性选择，则关注相对不足。本文正是进行此方面的研究，试图探讨一个在现实语境中更为复杂的问题：当个体已具备较高觉解，却因外部条件所迫而“向下”行动时，应如何理解这一现象？为此，本文提出“境界的策略性回归”这一核心概念。它特指：个体在已获得较高层次境界(道德或天地境界)的觉解后，出于对现实环境、生存压力或制度约束的策略性考量，而有意识地、暂时性地选择采取较低层次境界(主要是功利境界，乃至自然境界)的行为逻辑。简言之，“策略性回归”是“形为利，神为义”的异质性状态，它揭示了理想与现实、精神与物质之间的深刻张力。

2. 人生境界的理想进路与动态持守

儒家“下学上达”的修养路径强调通过修身克己、格物致知的工夫逐步实现精神提升，是单向向上的发展。冯友兰同样认为境界是单向向上发展的：自然境界及功利境界是海格尔所谓自然的产物，道德境界及天地境界是海格尔所谓精神的创造。自然的产物是人不必努力，而即可以得到底。精神的创造，则必待人之努力，而后可以有之。就一般人说，人于其是婴儿时，其境界是自然境界。及至成人时，其境界是功利境界。这两种境界，是人所不须努力，而自然得到底。此后若不有一种努力，则他终身即在功利境界中。若有一种努力，“反身而诚”，则可进至道德境界及天地境界([4], p. 506)。

冯友兰认为，道德境界及天地境界，是精神的创造，不是自然的礼物。自然境界及功利境界是自然的礼物，人顺其自然地发展，即可得到自然境界或功利境界。但任其自然地发展，人不能得到道德境界，

或天地境界。人必须用一种工夫，始可得到道德境界或天地境界([4], p. 582)。天地境界是最高的境界，作为“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终点，是人生终极的追求和最理想的状态。同时，冯友兰也意识到境界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境界有久暂”([4], p. 503)。为此，他强调“涵养需用敬，进学在致知”的持守工夫，即通过持续的道德实践和认知提升，来巩固既有的觉解，防止其因“人欲的牵扯”而退化。这说明，冯友兰的理论模型已包含境界的动态维度，但其重点仍在于如何“向上”持守，而对我们下文将要探讨的、在现代社会结构压力下普遍的“策略性回归”现象，则预留了理论拓展空间。

3. 境界“策略性回归”的现实呈现

人必须通过觉解的工夫才能达到道德和天地境界，但是人的精神是变化的，冯友兰认为此时就需要持守境界的工夫。人有道心，亦有人心人欲。“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一个人的觉解，虽有时已到某种程度，因此，他亦可有某种境界。但因人欲的牵扯，而不能常住于此种境界。伊川说：“涵养需用敬，进学在致知。”致知即增进其觉解，用敬即用一种工夫，以维持此增进底觉解所使人得到底境界([4], p. 504)。

冯友兰强调，“用敬”的工夫并非消极地压制欲望，而是通过持续的精神修养和行为实践，使已经达到的觉解状态得以巩固和深化。这种持守的工夫要求人在日常生活中时刻保持警醒，不断反思和超越自身的局限性，从而使其精神境界不至于因外在环境的干扰或内在欲望的动摇而退化。换言之，境界的提升并非一劳永逸，而是一个需要不断努力、反复实践的动态过程。

现实中，个体受制于生存压力、政策环境、社会竞争等外部条件，即使拥有较高的觉解，也可能被迫采取较低层次的行为。这在现代社会尤为常见。许多人在初入社会时怀有崇高的道德理想，但在经济压力、职场竞争、家庭责任面前，不得不做出妥协。这种“回归”并非完全自愿，而是一种被迫的“适应”或“生存策略”。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部分理想主义者的蜕变。古典思想中曾有流派主张摒弃物质欲望、回归本真状态，追求精神自由。其行为看似消极，实则带有强烈的道德批判性。然而，现代社会中有一些人，他们最初可能抱有公益理想或社会改革的热忱，但在遭遇体制的僵化、现实的挫折后，逐渐产生一种“看透却无力改变”的消极心态。他们能清晰地认识到道德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自认为具备了高程度的“觉解”，但因缺乏改变现实的能力或勇气，最终选择与现实同流，甚至比一般人更精于功利计算。例如，一些原本怀有正义理想的法律从业者，可能在司法实践的复杂与局限面前逐渐丧失信心，转而将专业知识用于为强势资本服务；又如一些曾致力于社会改良的知识分子，在屡遭挫折后可能变得愤世嫉俗，转向一种冷眼的现实主义。这类人的精神状态并非“觉解”的缺失，恰恰是“看得太透”后的精神放弃。他们的行为虽符合功利境界的逻辑，但其内在却是一种深刻的异化。这就是“策略性回归”的病理形态——当策略性的权宜之计被内化为永久性的生存信条，回归便退化为堕落。

与此相对，一种更为良性的“策略性回归”体现为“目的”与“手段”的张力。一位有家国情怀的企业家，若想有能力从事慈善事业回馈社会，首先必须维持企业的良性运转，就不得不在市场竞争中遵循功利逻辑。此时他的觉解在于：即使以“利他”为最终目标，也不得不暂时通过功利的手段来积聚资源。为了实现更高境界的长期目标，他暂时性地采取较低境界的短期手段。同样，自古追求“为万世开太平”的政治家，也必须通过权力博弈、利益交换来获取推行政策的资格。没有权力，政策便无从落地；没有妥协，共识便无法达成。问题的关键在于，主体是否能在手段的功利性中保持目的的道德性，是否能在现实的限制中不丧失精神的指向。这种“形为利，神为义”的状态，正是“境界的策略性回归”的典型表现。

在现代社会，觉解的获得来源多样化，可能来自教育或人生阅历，不再完全依赖传统修养路径。同时，价值多元化使得一个人可能在工作场合遵循功利逻辑，在家庭中强调道德责任，在艺术或精神体验

中偶尔触及天地境界。这种境界的混杂与摆动，不再是简单的线性发展，而是一种复杂的、多层次的生存状态。

因此，我们可以说，冯友兰的四境界说在理想层面上提供了精神发展的方向，但现实中境界的实现往往是充满反复、妥协与策略性回落的。这种现象并非否定境界说，而是对其现实复杂性的补充。

4. 策略性回归的伦理张力与实践智慧

上一章从经验层面描述了策略性回归的两种形态：一是病理性的蜕变，而是良性“目的-手段”张力，但这只是现象层面的分类。若要深入理解这一现象何以可能、其伦理边界何在，还需要从规范性的角度进一步展开讨论。策略性回归之所以构成问题，原因在于它触及了道德哲学中一个经典的两难：当一个人出于高尚的目的而暂时采取不高尚的手段时，这种做法究竟是道德的智慧，还是道德的滑坡？对此，单纯依赖冯友兰的觉解概念并不足以给出充分回答，因为觉解虽然能够解释个体对更高境界的认知把握，却无法直接回答“暂时回落”在何种条件下是可辩护的。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策略性回归不同于单纯的“手段-目的”理性计算。工具理性行动者将一切行为都视为达成既定目标的手段，其价值依据完全来自目标的有效实现。策略性回归的主体则不同：他并非将功利行为当作唯一或首选的行动逻辑，而是在特定情境下、出于对更高价值目标的维护而暂时启用较低层次的行动策略。也就是说，他的“回归”不是价值虚无的表现，恰恰是价值承诺在困境中的曲折表达。这一区别至关重要，它决定了我们应当在何种意义上为策略性回归划定伦理边界。

一个可辩护的策略性回归需要满足至少三个条件。第一，回归必须是“暂时的”且“有意识的”。这意味着主体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并且不将当前的功利行为当作长久的生活准则，而只是将其视为度过特定困境的过渡性安排。一旦困境解除或条件允许，主体应当有能力也有意愿回到更高境界的行为轨道。第二，回归的手段必须与最终目的保持内在相容性。通俗地讲，不能因为“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就去采用彻底违背该目的的恶劣手段。若一位企业家为了积累慈善资金而不择手段地污染环境或压榨劳工，那么他的“回归”就已经越过了可辩护的边界，沦为对功利逻辑的完全臣服。第三，主体在整个过程中必须保持反省能力。也就是说，即使暂时采取功利行为，他仍然需要不断地对自己的处境、选择和未来出路进行批判性审视，避免在功利逻辑中日渐麻木，最终遗忘自己原本的精神追求。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个条件实际上构成了对冯友兰“持守”工夫的一种补充性解释。冯友兰所说的持守，主要着眼于个体如何在内心层面抵御人欲的牵扯、保持觉解的稳定。而在策略性回归的语境下，“持守”不再仅仅是内向的修养工夫，同时也是一种在复杂的现实场域中进行判断和权衡的实践能力。

策略性回归的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即个体在不断重复的功利行为中逐渐认同功利逻辑，将当初的权宜之计内化为固定的生活方式。一旦走到这一步，策略性回归就完成了向病理形态的转化。这个过程往往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渐进式的、自我合理化的。主体可能一开始还会为此感到愧疚或不安，但随着时间推移和心理调适，这种不安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套自我辩护的话语——“大家都这样”“我不做别人也会做”“生存第一，理想以后再说”。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冯友兰所说的“用敬”工夫具有不可替代的警示意义。“用敬”要求人时刻保持对自身精神状态的反省，不因一时的便利而放松对高境界的追求。对于身处策略性回归中的人而言，这种“敬”的具体内容就是对“自己是否正在滑向功利认同”的持续警惕。

综上所述，策略性回归既不是道德的理想状态，也不是应当被一概否定的道德失败。它是现代人在结构性的现实困境中不得不面对的一种生存处境。承认这一点，并不是为道德妥协张目，而是为了更清醒地认识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并没有一条永远笔直的道路。有时为了走得更远，人不得不暂时绕行；关键在于绕行时手中仍然握着原来的指南针。

5. 理论反思与现代启示

陈来教授指出：“冯友兰的天地境界，其神秘主义并不导致虚无主义，而是‘与物冥合，万物皆备于我’的积极体验。在这种同天境界中，个人并非感到自身化为虚无，而是感到自身与宇宙大全的统一；不是感到意义的消失，而是感到自身获得了永恒的意义……冯友兰特意将他的神秘主义与佛道的‘虚无’倾向区分开来，他强调天地境界是‘经虚涉旷’而同时‘担水砍柴’、‘事父事君’，这其中的神秘体验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它不脱离日常人伦，因为不会引人走入空寂之境。”^[3]达到天地境界后并不会产生“悟”后的“空”，而是“悟”后的“充实”。然而，在现代社会，工具理性成为主导逻辑。道德尤其是天地境界的价值缺乏坚实的社会结构支撑，个体在强大的系统压力面前，为求生存发展，时常“不得不”策略性地回归到功利境界。

“策略性回归”现象揭示了人类精神生活的复杂性和现代人生存的两难处境。这反过来揭示了境界说一个内在的理论难点：它过于强调觉解的精神飞跃，而对实现精神超越所必需的社会物质条件和结构支撑讨论不足。在一个工具理性主导的时代，这种忽视使得‘天地境界’容易被视为一种知识分子的精神奢侈品，而非可普遍实现的生存状态^[5]。认识到“策略性回归”的可能及其根源，这本身就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觉解”。真正的境界持守，或许不在于永远停留在高处，而在于即使在下行或挣扎时，仍能保持一份对“高境界”的向往和反省能力。对于现代人而言，精神困境的核心不在于无法“觉解”，而在于“觉解”之后、在现实的强力拉扯下如何安顿自身。在张力中保持动态平衡的努力——既不被现实完全吞噬，也不躲入虚幻的精神高地——这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修身”与“工夫”。

参考文献

- [1] 冯友兰. 贞元六书·新原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 [2] 杜保瑞. 冯友兰《贞元六书》中的工夫理论与境界哲学[J]. 中国哲学史, 2020(6): 105-112.
- [3] 陈来. 论冯友兰哲学中的神秘主义[J]. 中国文化, 1996(1): 172-180.
- [4] 冯友兰. 新原人[M]/蔡仲德. 三松堂全集.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
- [5] 周晓莹. 论冯友兰人生境界说对现代伦理困境的启示[J]. 学术交流, 2014(12): 39-43.